

明代时期虞山书院的 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

程嫩生,马启超

(南昌大学 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虞山书院位于江苏常熟,是一所祭祀孔子弟子子游的书院。该书院创建于宋代庆元年间,之后屡废屡兴。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常熟知县耿橘加以修复,将它作为传播道德学术的重要场所。耿橘重视用会讲的方式吸引众多学者、文士前来砥砺问学、讲道较文,其文学教育与道德教育密切联系。在会讲之余,虞山书院还经常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其创作中的一些作品染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机构,也是宣传儒家思想的重要阵地。历代很多书院重视道德学术,将传道授学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而文学的载道性特点又为道德之学在书院文学教育中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书院文学创作也往往打上鲜明的道德烙印。明代时期虞山书院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只不过是反映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

关键词:虞山书院;文学教育;文学创作;道德学术;典型事例

中图分类号:I206.48; 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5)03-0132-05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3.020

虞山书院位于江苏常熟,是一所祭祀孔子弟子子游的书院。子游姓言名偃,春秋时期吴国人(其故里是江苏常熟),是孔子的一名得意弟子。孔门教育有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子游与子夏位居文学科。虞山书院创建于宋代庆元年间(1195—1200年),原名“文学书院”,元代时期颓圮。明代时期,虞山书院屡废屡兴,数易其名:正统年间(1436—1449年)修复后,易名为“学道书院”;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修复后,易名为“文学书院”;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修复后,易名为“虞山书院”。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修复与常熟知县耿橘有关。耿橘,号蓝阳,河北献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曾任河南尉氏知县,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调任常熟知县。耿橘重视教育,在担任常熟知县后的第三年修复虞山书院,将它作为传播道德学术的重要场所,文学教育也是该书院教育的一项内容。由于目前对虞山书院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笔者撰文加以论述。具体论

述时,针对耿橘掌管该书院期间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 文学教育

耿橘掌管虞山书院期间,重视用会讲的方式吸引众多学者、文士前来砥砺问学、讲道较文。耿橘是一些会讲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该书院在会讲之前,设立宾簿1册,以便给来访的宾客登名入簿,并为远方的宾客安排住所,提供茶饭。此外,还设立会簿1册,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身份者,只要愿意参会,都可在前一日或当日报名入簿。等到堂上宾主齐集,让吏书领入,照规矩行礼;若胸中有见,也允许他们上堂讲说。《虞山书院志》卷8记载了两次重要会讲的内容,时间分别是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重阳节。每次会讲为期3天,汇集了乡邑缙绅贤士以及远方鸿彦硕儒,人才济济,规模宏大。会讲采取问答的方式,内容有时涉及文学,他们对文学的讨论多与道德

收稿日期:2015-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08CZW013)。

作者简介:程嫩生(1974-),男,安徽桐城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古汉语与古文献研究;马启超(1990-),男,山东枣庄人,2014级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有关。如在一次会讲中,两浙巡盐御史左宗郢提出,莫将读书作文与学道视为二事,原因在于:“试思读书作文者是谁?都是我身心在此运用圣贤所说言语,都是说身心上事,文字总是发挥这道理,我尚不认得自己,岂能透得书中旨趣?岂能发挥得书中义理?不过是短竹掇拾,岂能动得人?今须着实在自家身上研求体认,将来道德文章总在这里。”^{[1] [卷7, P12-13]}从言辞中可知,作文与布道二者密切联系;要想作好文,就应体会圣贤之道。弦歌是古代的一种歌诗现象,《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同子游讨论弦歌一事,内容为“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2] [P2, 524]}由于子游担任武城县令时重视用弦歌的方式来化育民众,因此孔子对子游此举给予了肯定。为了纪念子游弦歌一事,虞山书院施教者曾在“言子祠(即‘子游祠’)之西北”^{[1] [卷1, P23]}建有弦歌楼。关于“弦歌”的含义,汉代学者郑玄解释为:“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3] [P797]}可见弦歌是以诗为依托,既有歌咏,又有奏乐。耿橘在郑玄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歌,歌诗也。古人学诗必歌,歌必比于琴瑟,所以和顺性情而即于道也。子游以生平所学而施之于政,所谓以斯道觉斯民者,非第富强之粗而已。”^{[1] [卷2, P2]}可见弦歌与道德教化紧密相依。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一次会讲中,生徒陆羽明认为“弦歌不是如今歌唱之类,乃弦诵也。民间俱诵诗读书,咏先王之风,此何等气象!子游之文学断非浅浅者!”^{[1] [卷8, P49]}由于陆羽明既揭示了弦歌的弦诵特点,又阐明了弦歌的布道功效,其解释言简意赅,深中肯綮,因此得到了耿橘的认可。总之,虞山书院会讲活动时所讨论的文学多与道德密切联系,因此,每次会讲既促进了道德思想的交流,又将该地的文学教育引入道德之域。

虞山书院建立了有本室,作为会艺场所。由于“仪文虽习而根本不存,终不可与入圣贤之道”^{[1] [卷10, P19]},因此,虞山书院建立有本室是为了弘道存本,勉励众人不可迷恋利禄、沉湎科举而丢失根本。武进薛敷教、吴江吴墨、邑人钱时俊、邑人瞿汝说等人曾为有本室会艺作序,从一些序文的内容中可知,这些学者都重视将文与道密切联系起来。如钱时俊在序中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雕龙绣虎之彦,辄诋讲学为土苴,而墨矩绳规之儒,又辄唾文章为鞞帨”,结果是,“道自为道,而

文自为文,文与道二也”^{[1] [卷10, P16-17]}。瞿汝说在序中论及八股文,他认为,“格似卑而道甚尊者莫如今制举之业”。其中,“格似卑”的原因是“以其拘声律局对偶束于考文者之功令,而不能大畅才士之致也”;“道甚尊者”的原因是“天下莫尊于圣贤之言,举业者,所以邮置圣贤之言而加之润色者也,非可以易言也。……必欲自见其所得而成一家之言,非根本道德而潜心问学者不能,其道可不谓尊欤?”^{[1] [卷10, P18-19]}此外,《虞山书院志》的编纂者张鼐为该志中的艺文志作序时也指出“‘有德者必有言’,言其所存者,至言也。……今夫学道者,必信于其中而后道德为真道德,事业为真事业,其为文章也亦为真文章。……夫有德之言,其补于世教也大矣。”^{[1] [卷9, P1-2]}由此可见,文以载道,文应明道;道与文紧密相依,不可分离;将道与文割裂开来的行为并不可取,更不值得效仿(从上述言辞中可知,施教者所言之“道”主要是指道德之学)。由于八股文写作要代古圣贤立言,重视道德宣扬,因此虞山书院的一些施教者对八股文这种科举文的价值进行了肯定。质言之,在诸多学者的主导下,道德教育成为虞山书院的重要教育内容,虞山书院文学教育也由此打上了鲜明的道德烙印。

明清时期,江苏虞山书院、江苏东林书院、安徽还古书院、安徽紫阳书院、福建共学书院、浙江姚江书院等一些书院重视会讲,以会讲的形式来传道授学。这类书院在会讲或祭祀中穿插了歌诗活动。明代时期,虞山书院所歌诗作主要有《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孝弟》等。其中,《孝顺父母》的诗作内容为:“问尔何从有此身,亲恩罔极等乾坤。纵然百顺娱亲志,犹恐难酬覆载恩。”《尊敬长上》的诗作内容为“等伦交接要谦虚,卑幼尤当肃尔容。慢长凌尊三尺在,谦爻皆吉傲多凶。”《和睦乡里》的诗作内容为“同里同乡比屋居,相怜相敬莫相欺。莫因些小伤和气,退让三分处处宜。”《教训子孙》的诗作内容为“人家成败在儿孙,败子多缘恃爱深。身教言提须尽力,儿孙学好胜遗金。”^{[1] [卷4, P29-31]}虞山书院的歌诗内容主要是孝悌、礼让、勤俭、守分等,目的是敦厚民风、止僻防邪,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家庭幸福、闾里和睦,从而促进地方民风健康发展,推动道德教化良性循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道德的作用极为重要,“道德作为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表征,构成了社会秩序与个体整合的必要担保。”^{[4] [P43]}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严守道德,社会秩序才会有条不紊,社会才

能和谐发展。儒家教育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虞山书院歌诗内容中的“修身”“齐家”思想对于“治国”“平天下”而言有着奠基的功绩。由于歌诗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虞山书院重视歌诗活动。该书院歌诗内容体现出的道德教化思想是耿橘秉承和发扬儒家道德之学的重要展现。

二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是中国书院的常见活动,在很多书院中屡见不鲜。由于创作出来的一些诗文对生徒创作又能起到一定的指导与示范作用(生徒有时也参与创作活动)因此可以说,书院中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文学教育活动。张新科先生论及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时便指出“在古代,文人结社或文学集团的出现,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学教育实践,文人在相互交流中提高自己。”^{[5][P80]}同文人结社或文学集团的创作活动相类似,书院中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可视为文学教育活动。明代时期,虞山书院经常有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丰富了文学教育的内容。

明代时期,一些学者、文士在虞山书院会讲期间创作了不少诗作,如邑人颜柟的《耿老师书院成,丙午重九大会,四方名公巨卿、孝廉文学一时群集,柟听讲三日,不觉茅塞之顿开也,敬步湛源先生、道澈家伯二韵》,邑人徐待聘的《陪耿令公会讲喜述》,邑人何允济的《陪耿令公书院会讲漫赋》,云间姜云龙的《同俞仲济赴虞山讲学之会发泖上作》,古粤王安舜的《虞山书院重辟,邑令主盟,乡绅有述,舜以数千里至,适逢其盛,步韵一首以识一时》。有的学者、文士由于某种原因虽未参加会讲,但也寄诗以示祝贺,如武进薛敷教的《赴虞山会泾里阻风寄耿令公》等。万历某年(1573—1619年)雪夜,耿橘同诸友会讲至夜分,参与者有邑人翁应祥、程玉润、张大受、严澂、孙森、徐待任、李乔新、瞿纯仁、王宇春、陆铕、钱世美、闽宁黄家谋、黄州化大顺、宁国朱朝选、维扬王道新等人。会讲结束后,耿橘要求诸位以“他年遇雪时,不能忘此夜”分韵赋诗。他们创作的一些诗作或描绘讲道较文的热闹场面,如翁应祥的“一时名理供谈吐,满座清风和咏歌”,程玉润的“幸哉此胜缘,切磋藉玄修”,瞿纯仁的“席间思聚散,诗兴共飞扬”,王宇春的“欲辩言何有,相看气倍澄”,黄家谋的“谈玄飞玉屑,析理听河悬”;或歌颂虞山书院的教育贡献,如程玉润的“斯文蔚复兴,千载遇

贤侯”颜澂的“卓哉瀛东侯,挺生振前哲”,瞿纯仁的“不办千秋业,焉知此夜长”,陆铕的“讲坛励群材,至人司教化”,朱朝选的“环桥观听人,千载称殊遇”,王道新的“千载遵良牧,斯文复兴起”^{[1][卷10 P26-31]}。邑人邵濂闻知耿橘雪夜同诸友会讲至夜分并分韵赋诗其乐融融,自己由于目疾未能参与,也怅然赋诗1首,诗作内容为“千山积素照书台,相见檐帷霁色开。辞泻玉河翻理窟,人依琼树集英才。临风鼓瑟寒光转,向月裁诗斗气回。蓬户敞貂凄自拥,问谁立雪夜深来。”^{[1][卷10 P32]}邵濂在诗中对虞山书院的教育贡献进行了表彰。

“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6][P1522]}在会讲之余雅集游玩,有助于舒展肢体,调节身心。虞山书院西边建有读书台,原为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的读书之地。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知县杨子器在旧址修建读书台,不久后废置。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此台得以重建。重建之后,一些学者、文士常来此台游玩并赋诗唱和,如邑人邵濂的《耿老师由弦歌楼开径属之读书台,引水通渠,傍植树木,暇日寻游赋此》,邑人钱希言的《虞山昭明读书台五歌为耿令公赋》,邑人徐培的《读书台》,邑人徐渊的《耿令公重修昭明读书台,严邵武记以述之》,邑人钱达道的《读书台次耿令公韵》《读书台又次耿令公韵》《读书台又次颜道澈韵》。除读书台之外,弦歌楼也是虞山书院雅集创作的重要场所,如姑苏王世仁的《秋夕耿令公招饮弦歌楼,见方池荷始花且喜,诸文学读书其旁,口占二绝》,金陵何栋如的《弦歌楼宴集赠耿令公》。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重阳节,虞山书院举行了一次会讲。可能是兴犹未尽,一个多月后,耿橘又召集学者、文士40余人举行了一次会讲。之后,他们在弦歌楼举行了雅集活动,张鼐为之作记。从记文内容可知,雅集当时景色优美“宾筵雅饬,四座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帘。觞咏恬恬,谭尘菲菲。轻音自和,不以丝竹。”此景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不过张鼐指出,他们并非以游玩觞咏为目的,而是以传道授学为旨归,雅集活动也可净化心灵、提升修养:“今夫讲学者传圣人之精神者也,众人执讲学以求圣人,而圣人之精神不传,则或于觞咏讌游之间而传之,然而知此者鲜也。则犹之乎一堂之讲学也,众人以为义理在圣人所传之书,其讲明分析在明道者之口与吾之耳,而于吾所讲之人了不相干,则圣人之精神何时而传乎?”^{[1][卷10 P2]}由此看来,虞山书院的这种雅集既是观赏游玩活动,也是学术交流活动。英

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认为,知识交流是心智扩展的一种手段,这种扩展不仅在于把以前未知的观念被动地接受到心智中,还在于心智同涌来的各种观念展开生气勃勃的富于建构力的对话^{[7] (P130)}。虞山书院就是通过会讲以及雅集等各项交流来扩展心智,使参与者在交流中增强对道德之学或文学的深切体认,既有力地推动了道德之学的发展,又使得道德之学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渗透开来。

三 余论

综上所述,明代时期,耿橘掌管虞山书院期间重视以会讲为纽带,吸引众多学者、文士前来砥砺问学、讲道论文。会讲之余雅集唱酬,创作了不少诗作。他们在会讲或雅集时进行的文学教育或文学创作多与道德有关,既为弘扬道德之学以及传递正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将虞山书院的文学教育引入道德之域,为江苏地区的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道德导向作用。

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野蛮向文明进化。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征途中,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8] (P8)}捷克共和国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9] (P39)}由于教育对于人而言有着扬善救失的功效,因此,要想化民成俗,要想社会稳定,要想和谐安康,就必须重视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道德教育往往占据着首要地位。若随意打开一部古代教育方面的典籍,稍作翻阅便会发现,“明伦”“载道”“为仁”“崇正”“乐善”“思贤”等一些布道词语很快映入我们的眼帘。中国书院崇尚道德的教育理念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的重视。远古时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一些君主具有圣德贤能,在化育民生、造福百姓方面堪称典范,因此深受后人景仰。“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10] (P3)}后代很多学者传承以及发扬远古时期圣贤君主的道德之学,为社会统治贡献重要力量。如春秋时期,孔子力推仁义思想,试图恢复社会稳定;战国时期,孟子宣扬仁政主张,将孔子学说推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政治混乱的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国君大多忙于战事。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如何推崇仁义道德来获取民心,而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来争夺霸权。逮及汉代,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下,汉

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学地位得以显升,儒家思想得以推崇。汉代以后的很多帝王重视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在帝王们的大力倡导下,很多士子都以弘道作为重要使命。中国古代社会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以“立德”为上。即使“立德”之人无功或无言,也会流芳千古;即使无德之人“立功”或“立言”,也往往得不到推崇。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学校,如周朝时期存在着官学与私学之分,出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6] (P1521)}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后代社会,官学与私学也一直并存。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科举的作用毋容忽视。自从隋炀帝实行进士科考试后,后代很多朝廷都重视以科举作为抡才大典。官学往往受科举的驱使,多重视科举文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不少官学有教养之名而无教养之实,在培育人才方面形同虚设。书院是代表儒家思想的重要教育机构。历代很多书院重视道德教育,通过教育培养道德人才,为造福乡间服务,为安邦定国服务。浇花需浇根,育人应育心。书院通过道德教育来净化生徒的心灵,使生徒笃于道德之府,进于圣贤之域。中国古代很多书院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轴心,围绕道德教育展开;道德教育对于其他一些教育而言,“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P2461)}。道德教育对于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而言,犹如舟之舵、马之衔,为这些书院的文学教育紧紧把持方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多与道德相连,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 (P270)}的布道工具,文学的载道性特点也为道德之学在书院文学教育中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书院的施教者在进行文学教育时往往不厌其烦地谈道论德,书院文学教育由此打上了鲜明的道德烙印。即使有些书院在进行文学教育时淡化道德说教,这些书院一般也不会出现反道德的叛逆思想。

毛泽东谈到书院教育时指出,若从研究的形式而言,书院要比官学优胜得多,原因在于:“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12] (P2591)}由于历代很多书院在雅集活动中从事创作或研讨学术,因此雅集活动“优游暇豫”而又“玩索有得”。历代书院的雅集场所对于今天而言已成为历史陈迹,不过昔日雅集活动那种活泼泼的场景被文字记录了下来。雅集活动体现出来的自由灵活、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对于沉闷的古代官学而言无疑是一种突破,值得当今教育者来研

究。需要说明的是,书院是讲学的重要场所,雅集游玩多为讲学途中的一种调节。由于沉湎于美景美酒容易使人玩物丧志,因此很多施教者主张雅集时不可沉湎于美景美酒,更不可把书院当作供宾宴、侈游观之地。即使在雅集游玩中,很多施教者也不会满足于山水诗酒之乐,而往往是将传道授学挂念于心。这种思想对创作有所影响,结果使书院雅集创作中的一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道德烙印(笔者曾发表《岳麓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石鼓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朱阳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信江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等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仔细分析)。尽管书院雅集创作多为情而造文,情不自禁,由衷而发,不过所发之情往往与道德紧密偎依,一般不会与道德相背离。“情感”与“道德”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词语,也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从书院雅集创作中可知,情感与道德虽然有别,但也有相融的一面。

参考文献:

- [1]孙慎行.虞山书院志[M].明代万历年间刻本.
[2]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

- 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李建华,冯丕红.论道德继承的基本属性[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5]张新科.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6]孔颖达.礼记正义[M].郑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M].高师宁,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9]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0]张玉书,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孔颖达.毛诗正义[M]//毛亨,传;郑玄,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Yushan Academy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G Nen - sheng ,MA Qi - chao

(Research Center of Gan - Hakka Dialect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y named Yushan was located in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which was selected Ziyou as sacrifice to idol and founded during the time of Qingyua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magistrate of Changshu County whose name was Geng Ju repaired the academy in the thirty - fourth year when was dominated by Emperor Shenzong and engaged in moral and academic education.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reation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morality. Academy w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of ancieant education and place of disseminating Confucian thoughts. Many academy leaders paid attention to moral and academic education and close connection of literary and morality which offered a favorable condition to moral permeating in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reation. The academy named Yushan was a typical case reflecting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Key words: the academy named Yushan; literature education; literature creation; moral and academic education; a typical case

(责任编辑 胡海金)